

人在矮檐下
有房不能住

德国东部小镇洛埃堡一些福利房屋住户最近比较窝火,因为根据一项新规,如果租住公寓面积超标,就有一些房间不能使用,否则他们将不得不搬出去。

当地房产管理部门说,新规范要求,福利房住户的居住面积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寿星多,宠物也高。

眼下日本不仅寿星越来越多,高龄宠物也日渐增多。

日本宠物食品制造商协会一项调查发现,日本约一半宠物狗年龄超过7岁,相当于人的50岁。

协会负责人之一望月胜雄说,日本宠物狗和猫之所以长寿,是因为它们营养均衡,接受先进医疗和主人细心照料。他说,日本人把宠物看作家庭成员,主人吃什么,宠物就吃什么。

由于日本人口稠密,住房狭窄,因此80%的宠物狗和90%的宠物猫都住在室内,减少生病和遇到事故的机会。

离奇索赔动物肇事

每年向保险公司理赔较多的人群中,汽车的车主总会占据一席,因为每年发生的车祸事故实在不少。不过,英国的保险公司还是会遇到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索赔请求,而这些事故的“元凶”都是不懂规矩的动物。

路透社说,在最奇怪的一个索赔案例中,一头鹿被一辆汽车的黄色保险杠所吸引,一头顶向这辆汽车的挡风玻璃,致使玻璃严重损坏。而在另外一个案例中,一头鹿撞碎了一户人家的厨房窗户,还好那只鹿没有生命危险。

英国最大保险公司诺威奇联合保险公司的年度离奇索赔理由名单上,动物们的名字赫然可见。公司一名客户索赔时说,她当时正在带她的仓鼠去看兽医,到了那儿才发现仓鼠早已咬破她的手提包跑了。

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



毛泽东在延安给高级干部作整风问题的报告,情况是真实的,认真审查干部也是必要的,但正常的审干活动后来被康生搞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把王明那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边区重演,则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康生虚构“红旗党”

1942年11月,康生一手制造了一个假特务案“张克勤案件”。张克勤当时才19岁,1937年在甘肃加入地下党,后来来到延安学习。康生以他父亲在兰州被捕自首为由,将他看管起来审讯了6天6夜,百般折磨。在“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下,张克勤作了“甘肃党是红旗党”的假口供,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反革命的“红旗党”。

1943年4月1日晚,康生

突然在延安报案机关逮捕200多人,并提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在各机关、学校、单位掀起抓特务、抓叛徒的高潮。延安1万多干部中,在审查中特务及失足者近千人,占10%。

4月中旬,康生又搞“坦白自信”运动,让张克勤四处作坦白报告,现身说法,搞假典型,推广他的“经验”。到7月,他在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说现在的审干就像抢救落水的人,不能从容地搞,要在紧迫的时间中去“抢救”。这个报告曾经被当时的延安青年称为恐怖的信号,实际是一种诱骗高压,使来到延安的广大青年,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青年,人人自危,恐惧万分。

整个边区,从机关到学校、工厂,从城镇到乡村,开始了“全线进攻”,并提出要“日夜抢救”,于是到处召开“抢救大会”、“规劝会”、“坦白会”,把边区搞得乌烟瘴气。特务多如牛毛,任何机关单位都钻进了各种各样的“国特”、“日特”、“CC”、“复兴”、“汉奸”、“叛徒”、“红旗党”等等坏人。

有这么一个故事,艾思奇正要举行婚礼的那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说他的对象有问题,艾思奇不能同她结婚。只好派人去通知新娘艾思奇有紧急任务出去了,今晚不能回来。第二天新娘在艾思奇的房间里守了一夜空房,婚没有结成,第二天新娘就被单位叫回去了。

毛泽东公开道歉

康生这个人狠手辣,在“抢救”运动中就暴露出来。陆定一记得,《解放日报》报社有一位总务科科长,是河南人,挨整受不了,刎颈自杀,本来已经抢救过来,可康生还是说他是河南的“红旗党”,是死特务。这个同志听说后,把纱布扯掉,终于死了。

这样的“抢救”,把15000人打成特务、奸细,许多党员干部都很气愤,向中央反映。刘少奇亲自找毛泽东谈话,问道:边区这么多特务,为什么没有发生大的泄密事件?徐特立多次质问康生,你说那么多同志都是特务,拿出证据来!

1943年8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强调

在整风审查干部中,反对逼供信,并提出具体的九条方针。毛泽东意识到“抢救”运动的问题,说“这是青年人的灾难”。他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并在11月5日规定“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5%,并一经坦白,立即释放。”

1943年10月,党中央决定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认为审干有“肃反扩大化”的倾向,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随后展开的甄别平反工作,直到1945年“七大”前夕才结束。

毛泽东后来在许多公开场合,向受害同志公开赔礼道歉。直到1945年初,他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还说“抢救”运动时发生了过火的“左”的错误,过火要不得,群众逼供信不好,并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他把手举到帽檐下:“现在,我把戴错了的帽子给你们取下来,陪个不是。”“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

会场上,同志们热泪盈眶,热烈鼓掌。 李蒙

毛泽东题写扇联 应林彪叛逃阴谋

1971年9月的一天,周恩来向毛泽东书面汇报林彪一伙准备叛逃的异常情况,请示处置办法。毛泽东阅过材料之后,在他喜欢用的一把丝绸折扇上题联说:“各求各志各行各路;离凡离圣离因果。”并立即叫警卫人员直接送到周恩来手中。

“各求各志”,意即各从其志,语出《史记·伯夷传》:“道不同不相与谋,亦各从其志也。”既然各有各的目的和志向,必然各走各的路。下句的“凡”、“圣”属于儒学范畴。儒学把人分为“圣人”和“凡人”,圣人指圣贤豪杰,凡人指人民大众。“因”、“果”乃佛家之语。作者借此表示辩证法的因果规律:林彪集团的反革命行径完全背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的神圣事业,背离了事物发展的因果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没有好下场。意即既然没法挽救,随他去吧。 梁颂成

1886年,当时在朝鲜负责防务的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说,朝鲜内部有人要联合俄国发起兵变,为了防备俄罗斯,清政府决定由丁汝昌和吴安康分别率领北洋、南洋舰队前往朝鲜的永兴湾,当时清政府的海军可谓精锐尽出,清政府希望通过自己海军在永兴湾的巡防,借以展示清政府强大的海军实力,制止俄罗斯可能的侵略。

在永兴湾巡防之后,丁汝昌又奉命率领舰队护送吴大澂前往海参崴,就在返程的时候,清政府有意无意下令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济远”和“威远”等4艘军舰前往日本长崎进行大修,其实在大修的背后也有着警告日本不要对朝鲜有所

老舍“过生日”给新风霞

“纪念老舍诞辰108周年·北京记忆——名家书画展”最近开幕,老舍之子舒乙透露了一个关于老舍和京剧表演艺术家新风霞“分享生日”的小故事。

据舒乙介绍,老舍阴历生日是腊月二十三。早年,他不怎么过生日,因为出身贫寒,生日总容易让他想到母亲和童年的悲苦。倒是老舍来拗不过朋友的热情,常常

被拉着过过阴历生日。

腊月二十三日恰逢“祀灶日”,民间俗称“过小年”。按照传统,老百姓都会祭灶神,吃民间小吃“糖瓜儿”。喜欢开玩笑的老舍先生总是说:“大家伙一吃糖瓜儿就会想起我。”

有一次过生日去看戏,那场戏的演员里有新风霞——当时她还是十八九岁的姑娘。老舍拿手绢包了一

包糖瓜儿到后台,分给大家吃,并说:“过生日,请大家伙儿吃糖瓜儿。”听到这句话,新风霞不住地抹眼泪。老舍问她哭什么,新风霞说自己心酸,打小悲苦,甚至没有亲人告知她生日是哪天。老舍说,别哭别哭,你的生日就是腊月二十三,跟我一样。从此以后,新风霞真的就选择了腊月二十三作为自己的生日,直至终老。

鲁迅24年收入480万元

从鲁迅日记考察,从1912年5月(鲁迅31岁)初到北京教育部工作,至1936年10月(鲁迅55岁)在上海病逝,24年中,鲁迅总收入12万多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480万元。

鲁迅平均收入的11.1%专门用来购置图书,共耗资1.3万多银元,价值约合今天人民币52万元(笔者注:1912年一块银元的实际购买力,约合今天人民币50多元;1926年一块银元合今天

40多元;1936年一块银元合今天35元以上)。书,在鲁迅看来,简直比吃饭更有价值。侍候鲁迅母亲生活了多年的帮工王某回忆:有一次,母亲劝鲁迅买几亩水稻田,供自家吃白米饭,省得每月向粮店买大米吃。鲁迅听了笑笑说:“田地没有用,我不要!”然后又大声说:“有钱还是多买点书好!”

鲁迅的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参考了数量惊人的古籍文献,

大半出于他精心搜集的藏书。他还利用藏书和借书编辑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即使如此,鲁迅还经常感叹:“书到用时方恨少”,并为一些珍贵的图书无法购置而遗憾。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9年,完全靠版税和稿费生活,当时每月收入700多元,相当于现在的2万多元。而当时上海一个四口之家工人的每月生活费不到40元。易文

北洋舰队曾用重炮 逼日本支付大笔赔偿金

动作的意思。1886年8月1日,高挂大清龙旗的庞大舰队出现在日本长崎港。

对于日本人来说,突然看到龙旗高扬、威风凛凛的中国巨舰,心中像打翻的五味瓶,惊叹、羡慕、愤懑等复杂的情绪兼而有之,也就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水兵引发了轰动一时的“长崎事件”。

1886年8月13日,一群中国水兵上岸购物,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结果一个日本警察被刺成重伤,一个中国水兵也受了轻伤,这个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到了8月15

日,舰队放假,数百水兵上街观光,就在水兵游览的时候,遭到早有预谋的日本警察的袭击,数百名日本警察将各街道两头堵塞,围住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挥刀砍杀,楼上的日本人也从上面扔石头袭击。中国水兵猝不及防,不仅没带武器,又在各街散布游览,结果吃了大亏,



“镇远号”军舰

《天云山传奇》背后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坛所涌动的“伤痕文学”的大潮中,安徽作家鲁彦周发表在1979年《清明》创刊号上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虽然涉及到“反右扩大化”的题材,但并没有听到批评意见,还获得了当年中国作协颁发的中篇小说一等奖。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把它搬上银幕。

当年,谢晋刚接本子的时候,就遭到了夫人的坚决反对。夫人说,这个本子太危险。理由是:小说是一回事,拍成电影影响太大,一旦出纰漏可就不得了。上影厂厂长徐桑楚得知后马上找谢晋谈话,说政治上出问题,他作为上影厂一把手可以负全权责任,这才解除了谢晋的顾虑。



《天云山传奇》剧照

影片公映后,虽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争论也相当激烈。1981年,首届金鸡奖评委会在杭州西湖召开。当时,最具有金鸡奖大奖竞争力的是《天云山传奇》和《巴山夜雨》。但把大奖授给哪部片子却难以确定,因为评委中分成数量相近的两派,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最终的投票结果,《天云山传奇》以微弱一票之胜当选。这一结果,无论是《天云山传奇》派,还是《巴山夜雨》派都感到遗憾。《天云山传奇》派的罗艺军评委提出了解决这一遗憾的建议:《天》和《巴》两部片子并列大奖,并以《天》排在前面。这个建议立即受到评委们的赞同。

不过,评委们的意见最后还要有关领导审定。令他们出乎意料的是,评选结果上报后,有关领导作出决定:将《天云山传奇》调到《巴山夜雨》后面,并不征求评委们的意见而直接汇报。

若干年后,权威部门出版的《当代中国的电影》一书中认为,谢晋《天云山传奇》的创作,鲜明地表现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为此,他荣获第一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徐庆全